

戊戌时期妇女运动侧重民族 革命的文化分析

韩 廉

【摘要】戊戌时期妇女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始终关注反帝救亡的民族革命，而相对淡化了对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其缘由除了海内外学者已论及的历史原因即当时的民族矛盾远比两性矛盾尖锐外，还有三个传统文化因素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重实用、黜玄想的致思倾向使戊戌时期妇女运动的参与者对强国保种实际需要的热情本能地高于对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批判；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使得国家和民族利益自然地成为戊戌时期妇女运动参与者压倒一切的选择；三、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方式使得戊戌时期妇女运动参与者将妇女解放的内容等同于一般人民解放的内容。

【关键词】戊戌时期妇女运动 传统文化 实用理性 家国情怀 整体思维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1-0041-07

Traditional Cultural Reasons for the 1895-1898 Women's Movement's Emphasis on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1895-1898 emphasize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gainst imperialism but neglected criticism of the male-centered gender system. In addition to historical reasons that have previously been mentioned (national contradictions were sharper than sexual ones) there were three traditional cultural factors that exerted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movement. First, the traditional tendenc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practice but despise theory meant that the women's movement was more enthusiastic for the practical need of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nd protecting the race" and less interested in criticizing the unequal gender system theoretically. Second, patriotism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looking upon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a as one's own mission" made these participants naturally put the nation's interests in the forefront. Thir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viewing the situation as a whole made the participants confuse the content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with that of general people's liberation.

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阶级革命（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统治的革命）、民族革命或种族革命（反对外来民族或不同种族压迫的革命）、社会性别制度批判（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压迫制度）。前二者是妇女解放的基本前提，后者则是核心内容。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河的戊戌

时期妇女运动（1895-1898），其主要特点是始终关注反帝救亡的民族革命，也比较重视阶级革命（对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的批判），而相对淡化了对更顽固、更根本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这一特点并贯穿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始终，而且影响着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价值取向。究其缘由，以往海内外论者多只关注

【收稿日期】2001-5-15

【作者简介】韩廉（1953-），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872

表层的历史原因，即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得民族矛盾远比两性矛盾尖锐，反帝救亡成为一切革命运动的当务之急。但细阅历史文献，我们不能不承认，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选择：

一、重实用、黜玄想的致思倾向使戊戌时期妇女运动的参与者对强国保种实际需要的热情本能地高于对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批判

古代中国由于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据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中国文化又是一种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要物质基础的农业文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使他们注重切实领会，而不追求精密严谨的思辨体系。加之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认为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无实在与幻想之分，故中国哲学家无一例外地肯定我们面对的世界是真实而唯一的世界，差不多一致地拒绝佛教哲学关于现实世界是虚幻不实的，应该超脱它的观念，注重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而且中国的哲学家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因天道难知转而注重人事。这些形成了中国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即以解决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执着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探求，而对纯抽象的思辨不感兴趣。这种致思倾向，就是所谓“实用理性”，它使得中国人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思辨理性的发展。^①

实用理性对戊戌时期妇女运动的参与者也浸润极深，使得他们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的形势下，很自然地全力关注强国保种这一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而相对淡化了似乎无助实用且又比较抽象的对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

这首先体现在，维新派发起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以及选择“反缠足”、“兴女学”作为

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都主要不是为了改变现有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格局，以解放妇女，而是为了满足保种强国的实际需要。甲午战后，维新派们一致认同当务之急是保种强国，而要保种强国首先必须要反缠足，兴女学，即实现妇女肢体与思想上的解放：“今之前识之士，忧天下者，则有三大事，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原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欲强国，必由女学。”^②“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过缠足乎？”^③因为他们认为，女子缠足与失学是国家贫弱的主要和直接原因之一。康有为在1898年与李鸿章辩论时就痛陈缠足在体质上对民族的损伤：“国家积弱，缠足未尝不是主因之一”，^④因为它使妇女“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传身体，或流传孙子，奕世体弱，是皆国民也，羸弱流传，何以为兵乎？”^⑤梁启超则提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因为妇女未受教育，一是不能求职自养，从而拖累男子和导致国家贫弱；二是心胸狭隘，造成家庭不睦，消磨丈夫的志量和才气；三是不能胜任教子的重任；四是不利于胎教和善种。^⑥于是他们掀起了以“反缠足”、“兴女学”为主要内容，强国保种为最终目标的中国近代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

其次，运动开展起来后，维新派也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强种保国直接相关的“反缠足”，“兴女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他们在其喉舌《时务报》、《湘报》、《国闻报》和其他著述中，浓墨重彩地宣扬“反缠足”、“兴女学”对强国保种的重大意义。康有为“一封朝奏九重天”，1898年7月向光绪帝上了一封《请禁妇女裹足折》，力图以中西比较证明放足可以强种来打动上听：“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尪弱纤孌，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乞特下明诏，严禁妇女裹足”，并对抗命者重罚，“如此，则风行草偃，恶俗自革，举国弱女，皆能全体，中国传

种，渐可致强”。^⑦梁启超则以通俗晓畅的《论女学》，向平民百姓娓娓细述女子受教育对国家民族的诸多裨益：首先，可以开发妇女这一占人口半数的人类资源，使其不但可以求职自养，减轻男子之负担，而且能成倍地增加社会财富：“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若此者，舍学未由也。”第二，可以使妇女真正具备为国育才的素质：“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苟为人母者，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则孩童十岁以前，于一切学问之浅理，与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第三，可以实施胎教而使种进：“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第四，可以将妇女自身也培养成为强国的人才：“欲强国，必由女学。……农业也，工作也，医学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男子所共能，抑妇人所共能也。其学焉而可以成为有用之才一也。”他也通过中西对比来强调女子受教育与国家的强弱息息相关：“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⑧在造舆论的同时，维新派还积极开展不缠足运动，组织女学会，创办女学堂，出版女学报等实践活动。他们推动广东、湖北、湖南等七个省区成立了大规模的不缠足会，其中参加上海不缠足总会者约达30万人。^⑨在不缠足会办得最有生气的湖南，成员也达数十万人之多。^⑩1898年他们与上海绅商、新闻界在上海共同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此后，淞江、广东等地也闻风而动，先后办起了女子学堂。

1897年春秋之交，维新派还在上海赞助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女子为主体的学会组织“中国女学会”。翌年7月，女学会又创办了《女学报》，向社会宣传妇女解放的意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还努力取得了光绪帝及部分地方大员对“反缠足”和“兴女学”的支持，使得该运动由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转化成合法的政府行为。1898年8月，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两江总督张之洞，曾为上海不缠足总会作《不缠足会叙》，以示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亲任湖南不缠足会董事，按察使黄遵宪则发布了《湖南署臬司黄劝谕幼女不缠足示》；两江总督、前南洋大臣刘坤一对经善元等禀请支持创办女学堂给予批示赞许，并批准女学堂利用木质关防，以昭信守。主流社会的认同使得“反缠足”、“兴女学”在上述七省区得到较广泛的开展，形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相形之下，维新派对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则显得火力不足。

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是一种基于性别本身产生的、男性压迫女性的制度。它与阶级、民族、种族压迫制度平行而又互补互动，并有其自身独立的运作机制，^⑪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其存在却是跨越历史、文化和地域的。这种社会性别压迫制度并非笼统地指全体男人一致压迫全体女人，而是指从总体看，女性都受男性的压迫，处于同一地位的男女之间关系不平等。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男女压迫被统治阶级的男女，而同时，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妇女还是被统治阶级的妇女，又受到本阶级男性的压迫。这种制度以性别决定劳动分工、工作待遇和行为方式等，男性总是比女性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掌握更多的权力。在戊戌时期，妇女运动参与者还不可能明确认识到性别压迫也是一种独立的压迫制度，只是觉察到了男性对女性压迫的不合理，他们对既成性别制度的批判也是比较幼稚地表现为对男性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失之简单。

在整个维新时期，他们对男性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理论批判：用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批判男性压迫女性的不人道和用妇女地位

文化形成论质疑妇女地位生理决定论。在进行前一方面的批判时,他们都只是简单地搬用人权概念,没有展开论述男女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什么,现存性别关系为何有悖人权。如康有为在戊戌时期集中批判男女不平等的一段论述,就是抽象的概念批判:“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人有自主之权”,“男女各有自主之权”。如果“男女之约”,不由自主,而是由“父母定之”,或者“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或者“一夫可娶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则“更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⑩梁启超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文章也是如此:“男女中分,人数之半,受生于天,受爱于父母,匪有异矣。……男子之强悍者,相率而倡扶阳抑阴之说,尽普天下之女子而不以同类相待。……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由前之说,则豢之若犬马,由后之说,则饰之若花鸟。”^⑪“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去圣弥远,古义浸坠,勿道学问,惟议酒食。等此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犹是天伦之爱,戚子而膜女。悠悠千年,芸芸亿室,曾不一事生人之业,一被古圣之教。宁惟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蔽其耳目,黷其聪慧,绝其学业,围阉禁锢,例俗束缚,惰为游民,顽若土番”。^⑫谭嗣同是戊戌时期最激进的思想家,他对封建伦常的批判是最激烈的,但用“天赋人权”学说来抨击男女不平等时也只寥寥数语:“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理应“平等相约”,“故重男与轻女者,至暴乱无礼之法也。男则姬妾罗侍,纵淫无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驯至积重流为溺女之习,乃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⑬而西方法、英、美国的女权运动兴起伊始,其诞生宣言或论著都较完整而准确地阐述了女性作为人类所应享有什么自然权利,现存男性中心的性别关系为何是对妇女人权的粗暴侵犯。

在质疑男性本位性别制度的基石——妇女地位生理决定论方面,维新派也是只提出问题,而未深入地展开论证。几个世纪以来,妇女的从属地位被归结于她们有异于男人的生理结构,既有的理论把女性的生物特性描述为先天的定命,把女性的被奴役归结为女性在生物体上的弱势。女性主义则认为,男主女从、男刚女柔、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角色,并非直接由

生理决定,而是由社会文化后天塑造成的。因此,妇女的从属地位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社会文化歧视的结果,妇女从属地位生理决定论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宿命论。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如严复、梁启超、《女学报》主笔康同薇、刘纫兰等,都已初步认识到男女性质虽异,但智力相近,造成他们素质和地位差异的不是先天的生理构造,而是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但可惜都语焉不详,没有深入论述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是如何逐步将女性塑造成现今这种从属角色的。

严复只是含蓄地指出:“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天不及,人不及也。”^⑭即是说男女素质的差别是人为的而非生理决定的。梁启超虽然旁征博引,证明男女治学各有千秋,而从总体看不分高下:“西人格致家之言曰,言算学格致等虚理,妇人恒不如男子,由此等虚理而施诸实事,以成为医学、制造等专门之业,则男子恒不如妇人。然则男女之于学,各有所长,非有轩轻。”男女从生理上看智力不相上下,差异是后天教育形成的:“论者或疑数千年来,男子之成绝学,立大功者,方策不绝,而妇人无闻焉,若是乎虽兴妇学,其所成亦仅矣。抑吾又闻生学家之言公理矣,凡含生负气之物,倒生者最愚,横生者次愚。若夫躯体峙立,首函清阳者,其聪明必不甚相远。所以生差别者,在智慧开与不开耳。……彼妇人之数千年,莫或以学名也,未有以导之也。”而且,他还敏锐地洞察到,中国妇女几千年来一直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处于愚昧无知的奴隶地位,其才智未得开发,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实行愚民政策:“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则为君者从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则为男者从而奴隶之。臣妾、奴隶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缚其手足,冻其脑筋,塞其学问之途,绝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贴耳于此强力者之手,久而久之,安于臣妾,安于奴隶,习为固然,而不自知。……以故数千年来之男子,无或以妇学为治天下所当有事,而数千年之妇人,益无有奋然自张其军,以提倡其同类者也。非不才也,压力使然也。”^⑮但他仍然没有具体论述中国封建统治者是如何通过社会文化塑造妇女的。康有为之女康同薇也通过中外比较开始质疑女子天生不如男的论调,认为男女现存的差异另有所因:“同薇居常想念,以为天

之生斯民也,既有男女之分,即有智愚之别,虽有巧妇,不及拙夫,虽有贤姬,不如莽汉,天所兴废,人无能为。及今思之,乃知有大谬不然者。何言之?波斯,印度,耻其国之有女也,不敢以示人,美利坚睹其女之多也,群喜而贺之。夫亦犹是人也,而轻重若此,乃知男女之轩輊,良有所因”。她指出欧美、日本重视女子教育,故女性能同男子一样学有所成:“其学校之制,凡男女八岁不入学,罪其父母。幼学处所,男女并同,及其长也,别为女学以教之。学分三等,循序而升,高等师范,下及百艺,视其性近,乃入专门。由是辅之以女红场,广之以女学会,上以蓄德,下及艺事。……故美、法之女,有为臬司者,英、美之女,有为天文生者、典史者,有为传电报、司文案、医师、律师、教授、传教者,类皆与男无异。”^⑧可惜至此戛然而止。显然其本意是认为男女差别形成于后天教育,但未明确提出这一点,也未进一步论证中国女不如男是因为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画龙而不点睛,功亏一篑。

相形之下,西方早期女权运动对此批判较力,如英国女权运动一开始,其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于1792年推出了长达300页、13章、共20多万字的专著《女权辩护》,系统地论述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如何共同将女性塑造成一种从属角色的。

概而言之,维新派对既存性别制度的批判是激情有余,而思辨不足。

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使得国家和民族利益自然地成为戊戌时期妇女运动参与者压倒一切的选择

在中国古代,由于一直实行几代同堂、“同居共财”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制度,各个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不独立,必须仰赖家庭的共同财产生活,家庭的命运也即个人的命运,不像西方的家长制家庭公社早在中世纪已经解体,逐步为财产个人私有的个体家庭所取代。所以,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并引申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位主义。其主要表现是把家庭、社会看得比

个人更重要,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此外,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体特征之一是关心现实政治,中国哲学家热衷于“究天之际,通古今之变”,各家各派都“务为治”。这些使得中国文化执着于他人、国家和社会问题,最终演绎成一种“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深沉的历史责任感,^⑨并且深深融化到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人格,一种集体无意识。它激励着中国历代的志士仁人进退皆忧,宠辱不计,始终以天下国家为重,每当外患或者屈辱加剧时,国家和民族利益总是本能地成为他们压倒一切的选择。

这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也早已内化成戊戌时期妇女运动所有参与者的自觉心理认同,而当时又正值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也主要是为了反帝救亡而发动妇女解放运动的,民族革命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妇女运动的第一要务。

综观整个维新时期,妇女运动的参与者无一不视强国保种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梁启超的《倡设女学堂启》便是涌动着如此的灼热情怀:“甲午受创,渐知兴学”,“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昌而明之,推而广之,乌乎,是在吾党也矣!”^⑩巾幗于此也不让须眉,《女学报》的主笔之一裘毓芳向人们痛陈列强企图灭亡中国的危险局势:“近数十年来国日益促,财日益困,民无以为生。泰西诸国,迭起图我,忍辱受侮,坐视死亡。”^⑪另一主笔刘纫兰则响亮地提出“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⑫,道出了先进女性愿与男子共赴国难的心声。卢翠女士的《女子爱国说》更是通篇洋溢着赤子之情:“中国四万万,吾辈实占二万万,向使吾辈皆如西国女子,人人读书,人人晓普通之学,人人习专门之业,不特于一家之中,大有裨益,即一国有事,亦岂无以报效于毫末哉!”她列举了古今中外各爱国女子的事迹,尤其对美西战争中美国女子的爱国热情赞赏有加:“斯可谓有谋国之志矣。噫!东方女子,岂不若西方女子之忠忱爱国乎?方今瓜分之局已开,国势日危,有声同叹。前月明诏特下,谕各庶民,皆得上书。

夫民也者，男谓之民，女亦谓之民也。凡我同辈亦可以联名上书，直陈所见，以无负为戴高履厚之中国女子也。”^②于是提出了提倡女学，公举12人为女学部大臣，开女特科等七条建议，爱国之情，跃然纸上。许孚女士也是当仁不让：“女学既兴，远可保教，近可保种，强神州宁有过耶！……陆象山曰：‘宇宙内事，皆吾性分内事。’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若君之勇于力新皆足以药世之委靡，岂独女学一事为然哉！”^③连作为封建统治大员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上海不缠足总会作《不缠足会叙》，也是出于一片拳拳之心：“吾不惟伤此中华二万万妇女，废为闲民僇民也；吾甚惧中华四万万之种族，从此嵬琐疲癯以致于渐灭也。”^④传统文化的强大张力及润物无声，于此可见一斑。

三、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方式使得戊戌时期妇女运动参与者将妇女解放的内容等同于一般人民解放的内容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以经验为基础，偏重于对事物作抽象的整体把握，强调要从统一的角度去观察事物，注重事物的整体性与过程性，这是正确的，本质上是一种辩证的方法，对于人们把握认知对象的总体，领会其普遍联系，特别是领会其某种不可言喻的意蕴，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其缺点是不重分析，不善于把整体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进行研究，对小体事物和事件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也即只注重对矛盾普遍性、绝对性的分析，而不注重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因而具有笼统性的严重缺陷。^⑤

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对戊戌时期妇女运动的影响是，使得妇女运动参与者将妇女解放等同于一般人民的解放，只看到两种解放的普遍性、共性，即都需要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中获得解放；但却忽视了妇女解放的特殊性、个性，即还需要进行推翻性别压迫这一更深层次的革命。因而戊戌时期妇女运动的参与者大多认为，妇女解放就是妇女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中解放出来，所以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总是注重

于反帝救亡或反对封建压迫，而较忽略对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

如除了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视为妇女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外在威胁，全力以赴之外，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妇女运动的领袖又将妇女在国内所受的痛苦统统归因于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这种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认为妇女要解放，就要对内摆脱这种桎梏。严复委婉地提出，中国妇女受压迫是由于“政教之不明”即封建制度和封建伦常的不合理所造成的，妇女只有冲破缠足、失学、包办婚姻、纳妾等封建陋俗和伦常的束缚才能自立：“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⑥梁启超也是温和然而深刻地指出，封建统治者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剥夺了妇女的受教育权，使得广大女性无学识而无从执业，经济上不能独立，不得不受其奴役：“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则为君者从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则为男者从而奴隶之。臣妾、奴隶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缚其手足，冻其脑筋，塞其学问之途，绝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于此强有力之手。”“‘妇人无才即是德。’此警言也。世之誓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以妇人为不足轻重，而不复教之。既不教矣，其无从执业，有固然也。”“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⑦所以他极力提倡妇女冲破封建伦常及陋俗的束缚，放缠足，受教育，求职业，以获得经济上的自立。谭嗣同由于深受三纲之苦，则不再闪烁其词，明确地指出封建制度和封建纲常是妇女和其他人民所受压迫的总根源。他入木三分地形容三纲是封建统治者为“钳制天下”而专门制造出来的“钳制之器”，几千年的名教，造成“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烈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扼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⑧这种学说，到了宋朝，更是“惨鸷刻核，尽窒生民之灵思。”“君臣之祸

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三纲使得公婆可以名正言顺的虐待媳妇:“虏役之而已矣,鞭笞之而已矣。至计无复之,辄自引决。村女里妇,见戕于姑恶,何可胜道?”三纲也造成了“夫妇之道苦”,首先使妇女婚姻不能自主,而由父母代庖:“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渺不相关之人,絮之以终身,以为夫妇,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权而相苦哉?实亦三纲之说苦之也。”其次残忍地剥夺了妇女的再婚权:“于古有下堂求去者,尚不失自主之权也。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汤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誓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他对封建君主为了一

己私利而制定三纲,使得手足相煎尤为深恶痛绝:“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父子夫妇之间,视为锥刃地耳。”^⑩所以他呼吁冲决一切网罗,自由自在地活动,达到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实现人与人之间,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也即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争取妇女和广大人民的解放。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浸染源远流长,使其与西方女权运动风格迥异,利弊并存。就此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健全和提升,对国际女性学中“本土化”内容的拓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①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357页;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196页,191-192页;商榷德等:《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②⑥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43页,第38-41页。

③曾继辉:《不缠足会驳议》,《湘报》,第151号,1898年9月10日。

④据康有为女康同璧回忆,1898年康有为上《请禁妇女裹足折》后与李鸿章辩论缠足问题时讲了此话。《中国妇女》1957年第5期。

⑤⑦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

⑧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41、43页。

⑨⑩《劝戒缠足丛说》,《万国公报》,1900年第6号,光绪二十六年六月。

⑪(美)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24、30-32页。

⑫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282、283页。

⑬梁启超:《戒缠足会叙》,《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0页。

⑭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51页。

⑮谭嗣同:《仁学》,周振甫选注:《谭嗣同文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115、186页。

⑯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二册(下),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468页。

⑰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第42-43页。

⑱康同薇:《女学利弊说》,《知新报》第52册,1889年5月11日。

⑲参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70页;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275页。

⑳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51-52页。

㉑裘毓芳:《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女学报》第7期,1898年9月。

㉒刘纫兰:《劝兴女学启》,《女学报》第4期,1898年8月20日。

㉓卢翠:《女子爱国说》,《女学报》第5期,1898年8月27日。

㉔许孚:《潮州饶平县隆都前溪乡女学堂记》,《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

㉕张之洞:《不缠足会叙》,《知新报》第29册,1897年8月28日。

㉖参见(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1年版,第172页;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第300-302页;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219-220页。

㉗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二册(下),468-469页。

㉘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第42、38、39页。

㉙③⑩谭嗣同:《仁学》,周振甫选注:《谭嗣同文选注》,第111、186-187页。